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总主编 刘永佶

咀头村调查

「东乡族」



杨思远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咀头村调查

(东乡族)

杨思远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咀头村调查 / 杨思远主编.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6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ISBN 978 - 7 - 5017 - 9974 - 9

I. ①咀… II. ①杨… III. ①乡村—东乡族—民族经济—社会调查—晋宁县 IV. ①F327.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46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孙 岩 (电话: 010 - 68359418)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 × 240 毫米 1/16 印张: 24.75 彩插: 20 张 字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974 - 9/F · 8377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刘永佺

委 员 李俊清 张丽君 李克强
杨思远 党秀云

主 编 刘永佺

本书分工

- 杨思远：全书设计与统稿、前言、第九章、第十二章第3节、第十六章第1、2节、第十八章第1节、后记
- 刘江荣：第一章、第十三章第1、2、3节、第十四章第1节、第十五章第1节、第十六章第3节、第十八章第2、3节
- 包玉才：第二章、第十一章第1节
- 刘建利：第三、四章、第十二章第4节、第十六章第4节
- 韩 坤：第五、八章、第十一章第2节
- 黄媛媛：第六章、第十章第2、3节、第十一章第5节、第十二章第5、6节、第十三章第5、6节、第十七章第1、2节、第十八章第4节
- 姬良淑：第七章
- 戴婧妮：第十章第4节、第十一章第4节、第十二章第1、2节
- 任正实：第十二章第8、9、10节、第十五章第2节
- 巴特尔：第十章第1节、第十一章第3节、第十二章第7、8节、第十三章第4节、第十四章第2、3节
- 李兴媛：第十七章第3节

总 序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的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论从哪个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以往的民族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某一村庄的专注系统调查。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反思许久，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入调查，总百余村，每村一书，为中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百村，不及中国村庄万分之一。我们的村庄调查虽只是

咀头村调查

抽样性质，但却是探根摸底，力求深入、真实、详细。二〇〇八年夏各组分赴河北、内蒙、宁夏、云南、广西调查点，历经一月左右，获初步资料。因为首次，困难颇多，思路和方法也要不断调整，秋、冬写作时又各自补充调查。时间虽短，但师生与村官、村民情谊颇深，既为调查提供条件，又为后续补充予以协助。各地党、政机构，对调查全力配合。无此，则调查难以进行。这套丛书，实为共同努力之成果，并赖中国经济出版社黄允成社长、孙岩主任鼎力支持，得以出版。本调查还要持续数年，望读者批评，我们再努力。

劉永信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前 言

东乡族咀头村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

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洮河以西，大夏河以东的山麓地带，人口 513805 人^①，其中半数以上聚居在东乡族自治县，其余分别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广河、和政等县。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据《蒙古秘史》和其他史书记载，“撒尔塔”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即回回人。一般认为，东乡族是 13 世纪 20 年代，以东乡地区的回回色目人为主体的，加之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解体的撒尔塔人，融合部分蒙古族、汉族而形成的。东乡族有民族语言，但无民族文字，信仰伊斯兰教。新中国建立 60 周年来，东乡族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快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总体上看没有摆脱贫困。

咀头村是东乡族自治县汪集乡的一个行政村，下辖街道社、咀头社、对把子社、李家社、上老庄社、下老庄社和胡拉松社 7 个自然村。咀头村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东乡族自治县具有典型性。2009 年 7 月 12 日—8 月 1 日，笔者对该村的贫困性质和原因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个典型的贫困县。2008 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1419 元，28 万人口的县财政收入只有 2416 万元。^② 2001 年东乡县被国家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4 个乡镇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乡镇，192 个

①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② 马维纲：政府工作报告——2009 年 1 月 10 日在东乡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咀头村调查

村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16.94万人界定为贫困人口。^① 该县汪集乡咀头村则是个典型的贫困村,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1270元,咀头村213户家庭中有91户属于低保家庭。^② 贫困是东乡族经济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咀头村的贫困不过是整个东乡族贫困的一个样板,因而成为我们这次东乡族经济调查选择对象的主要依据。

造成咀头村经济长期不能脱贫的根源何在?这是本次调查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听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诸多答案。

在咀头村,将贫困归结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尤其归结为干旱缺水,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回答。黄土高原被冲蚀而成的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丘陵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许多地区成为不毛之地。每年200~300毫米的降水更使咀头村十年九旱。严重缺水几乎是解释一切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站在破碎的黄土高原的山坡上四周观望,凡是沟壑内部植被一定好于山坡,凡是平川地的作物长势一定好于坡上梯田。至于小麦和洋芋(东乡族语,即土豆)之所以成为咀头村的主要作物,均可从干旱缺水得到解释。小麦单产之低,洋芋之成为救命作物,还是因为干旱。咀头村李家社何有苏家1989年修建面积为40平方米的房屋花了11000多元,而2005年为大儿子结婚修建的同样面积的住房只花去7000多元,根源还是因为水。1989年建房用水取自20公里外的锁南坝镇,成本昂贵;2005年后接通了自来水,建房成本因之猛降。解决用水问题,已经成为东乡族自治县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此看来,将贫困归结为缺水似乎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牧业为主导产业,缺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有现在这般强烈。

还有一种类似的观点,也是把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自然条件,认为咀头村地下无矿藏。此种观点解释说,如今富裕之地不是煤铁蕴藏丰富,就是富集石油天然气;咀头村地上无水,地下无矿,山是土山,连一块石头都没有,贫困是必然的。这种看法的合理之处在于,单纯的农牧业在现今时代是不能致富的,工矿业才是致富之道。问题在于,工矿业的存在同本地有否矿藏是两回事。中东地下石油蕴藏千百万年了,但也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

^① 东乡县扶贫办主任马学忠,在省政协“推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2009年6月23日。

^② 东乡县汪集乡,2008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009。

成为世界油都；日本自然资源尤其矿产资源相对贫乏，但它却是世界三大工业中心之一。所以说，不是咀头村地下无矿才贫困，而是因为贫穷不能建成现代工业体系。

文化素质低制约了东乡族经济发展，是造成咀头村贫困的根源，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上至干部，下至村民；既有阿訇，也有普通穆斯林。这种看法将贫困的根源从自然条件转移到主体人，在寻解问题的道路上是个进步。但是，人本身是生产劳动的产物，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人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采集渔猎生产方式对体力要求不强，因而妇女可以主导氏族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对体力的要求大为提高，父系社会出现。农业生产靠经验，工业生产靠科学。人的文化素质低，一方面要视做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要看成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原因。在咀头村调查中，多数东乡族农民家有两三个孩子，但能读到初中毕业的很少。问其故，有贫困读不起书的，更多是孩子自己不愿读，也有很多家长认为读书无用。咀头村首富赵忠华，在兰州开有宾馆，在青海有羊绒生意，在新疆开过金矿，但他只是高中毕业生；街道社的牟占虎自己开了家服装店，同时出租17间门面房，是街道社有名的富户，但他是个文盲。不过在我们对这两位村民进行采访时，他们普遍感到生意上缺乏文化是个巨大的限制，尤其是牟占虎，不识字无法进货，更不会签订合同、记账和算账。这说明工商业经营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是从事传统农牧业的确不需要多少文化。在咀头村特别是在下老庄社、胡拉松社和对把子社的调查中，大多数家庭孩子只念到小学，文盲相当普遍，他们认为，荡羊（东乡族语，即放羊）、种麦子和洋芋无须识字。另一方面，自给性的农牧业生产，商品率极低，货币收入很有限，靠卖点洋芋和几只羊，靠外出打工挣点钱，只能用来贴补家用，盖房、结婚、治病、丧葬都会形成巨大债务，无钱供孩子上学。上小学和初中由于政府免除学费、杂费和书本费尚可支撑，上高中则难以负担。至于供养一个大学生，在整个东乡族乡村基本没条件。许多大学生不愿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学无所用，用可无学。这种情况表明，传统农牧业不仅供养不出高素质的劳动者，也排斥这种劳动者，将文化素质低作为贫困的根源，实实倒因为果。

缺乏资金是贫困的根源。这种观点在咀头村干部和群众中相当普遍。其实，资金是价值概念，缺乏资金和货币型贫困是同语反复，这只要追问一句：为什么会缺乏资金？答案就会归结为贫困。穷是穷的根源，富是富的理由。

咀头村调查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这被归结为马太效应。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作为生产结果的贫困，就不能说明作为再生产结果的贫困，再生产总是将生产的条件与结果再生产出来。

基础设施落后才是贫困的根源。咀头村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会地带，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属切割破碎的黄土高原沟壑地貌。山坡陡峭，雨裂发育，切割颇深，悬崖峭壁处处可见。“人们形象地说，这是‘碰死麻雀滚死蛇’的地方，山坡陡度一般在 30° 以上，有的达 70° ；宽度一般为30~50米，深度为30~70米，呈V字形。‘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①这种地形地貌使交通运输极为不便，道路建设成本高昂，交通事故率高，通讯信号质量不佳，手机时常找不到信号。穿越咀头村的锁达公路2008年才成为二级公路；咀头村至各社的路都是狭窄的土路，供摩托车和农用车行驶。建材运输、农产品外销，落后的交通都是一个重要限制。7月25日上午我们步行从上老庄到下老庄去调查，途遇一老乡用兰驼牌农用车运一只羊去赶集，交通运输成本之高可以想见。但是，将贫困归结为基础设施同样不可靠。基础设施建设是与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同步的，它是为满足市场需要，同时又是从市场取得供应的工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给性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要件。道路建设尽管是脱贫的一个条件，但不是根本原因，只有摆脱自给性生产，才能充分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作用，才能产生建设新基础设施的要求和条件。

“因病致贫”四字，在咀头村调查中常能听到，亦能找到实例，但我深表怀疑。吃喝穿用住行，结婚、生育、治病、丧葬都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正如我们不能将吃饭归结为贫困的原因，相反，要把吃不好视做贫困的表现一样，我们也不能将治病视为致贫之因，而要将有病不能医治当做贫困的表现。如果说某个家庭被吃穷或病穷，那一定是这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需要，靠省吃俭用和有病硬扛的途径致“富”，充其量只是有点余钱而已，这种“富”与其说是财富生产的结果，不如说是财富消费的产物。这在扩大消费的时代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是一种交换关系，如果生产中没有形成细密的社会分工，交换就是没有必要的。咀头村的农民普遍从事自给性农牧业生产，

^① 马志勇．东乡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3.

小麦和洋芋种植主要是满足家庭食用，养羊也是以户为单位，贴补家用，这种自给性生产排斥社会分工，市场仅仅作为了有限剩余产品的市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得到扩展。生产决定交换，在自给性生产方式未根本解体的情势下，试图通过牛羊市场和洋芋市场的建设来摆脱贫困，是舍本逐末之策。

下苦人（东乡族语，即劳动力）不足论。土地承包到户，每个家庭必须要有下苦人，否则承包地不可能有小麦和洋芋收成。许多丧失劳动力的家庭的确陷于贫困，但问题是整个咀头村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输出，全村劳动力富余和某些家庭劳动力缺乏可以同时存在，这恰恰说明，劳动力不足不是绝对的，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组织的存在，相对于家庭承包的土地来说才有劳动力不足。对于另外一些家庭，却是苦于劳动力过多。家庭劳动力不足和全村劳动力过剩同在，一家劳动力不足和另一家劳动力过剩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将贫困归结为劳动力不足而不是归结为家庭经济组织呢？

乡村两级机构缺乏独立财政。在同乡村干部座谈中，当我们问及关于咀头村未来发展的规划时，他们普遍表示，由于缺乏独立财力基础，任何长远规划不是忽悠百姓，就是流于空谈。他们说，基层选举将百姓召集起来轰轰烈烈，候选人许下诸多宏愿，但乡村缺乏独立财政来源，无力兑现这些空头许诺。他们认为，如果乡村有独立财政能力，将项目资金统筹运用则会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将乡村两级机构缺乏独立财政视做贫困原因很难成立，因为当前的农村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即使乡村有独立的财政能力，面对的却是千家万户，不可能形成全村整体规划，独立财政只能加快一些农户的致富，而造成另一些照顾不到的农户难以脱贫。所以，乡村有无独立财政能力在现行小农经济基础上与贫困无涉。

56个民族56朵花，东乡族是朵苦菜花。咀头村、汪集乡和整个东乡县长期贫困，关乎东乡族长远发展，威胁整个民族的根本福祉。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咀头村贫困的根由到底是什么，任何一个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不能不负责任地轻下结论。

二

为了探索咀头村贫困根由，我们必须首先对该村贫困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贫困首先表现为农民不能以自己的生产物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这里不是探讨一般贫困的问题，而是咀头村的贫困问题，因此将贫困的主体确定为农民。我们必须立即对“自己的生产物”作出说明，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不是用“自己的生产物”直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而总是以“别人的生产物”来满足需要。但是，用“别人的生产物”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无偿的，而是以“自己的生产物”交换得到。“自己的生产物”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咀头村农民自给性消费的小麦、洋芋等；另一部分通过交换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如咀头村农民用所养的羊、牛等换取零花钱，以贴补家用。因此，如果我们不明确使用“直接”或“间接”的限定语，贫困是指农民不能用“自己的生产物”来满足生活需要的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关于“生产物”还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它不仅是指咀头村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农畜产品和手工业品，也包括他们外出打工的劳动生产物，但这两部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小农经济范畴，后者是市场经济范畴。本文第四节将说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对咀头村农民脱贫的意义。

“基本生活需要”是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结构和水平是不同的。温饱二字只是指吃与穿两项，水平是饱和暖；“小康”二字包含的内容要丰富一些，吃喝穿用住行均在“基本生活需要”之列，其水平在足量的基础上始求优质。道德的限制是个社会限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什么样的需要被列入“基本生活需要”，以什么样的对象和方式满足这种需要，都有符合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咀头村村民全部是东乡族农民，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古兰经》对每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规定了许多准则，提供了一整套道德标准，对“基本生活需要”的确定有重大影响。阿訇的需要就不同于普通穆斯林。再贫困的穆斯林也会自愿向清真寺捐献，这些捐献按照伊斯兰道德标准是应当被列入“基本生活需要”范围的。

“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容包括吃喝穿用住行。对于咀头村来说，吃食异常简单，主要是面食和洋芋，多数村民早餐主食洋芋，午餐可以吃饼子或拉条子，洋芋做菜或调料，晚餐和午餐差不多。蔬菜是有的，但不多。他们很少吃肉，尽管几乎家家都养畜禽，但牛用于犁地，驴子用来运输，羊用来出卖，只在节日或重要日子里才会宰鸡或羊。东乡族生活于干旱和寒冷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合部，增加热量和消除干渴的需要使得他们对茶叶有巨大需求，

茶是东乡族群众生活必需品。普通咀头村村民对于穿没有过高的需求，在调查中，六口之家一年衣着开支为 2000 元左右，更为贫困的只有 1500 元，这包括全家四季衣服鞋帽开支。在用的方面，可能受到伊斯兰教影响，很多咀头村人家除电灯外没有其他电器，老一辈认为电视和电脑会教坏年轻人。生活用具不少是自制的，厨房用品仅限于最必不可少的不能自给部分。过去床上用品多为家庭手工制作，如今基本靠买。电视约有 1/3 的人家购置了，但收视时间很短，家长怕孩子学坏，限制收视。咀头村村民住房水平并不低，重视修房盖屋，是东乡族的习俗，民居有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两种，但完全砖木结构的建筑是罕见的，大多是前墙用砖和瓷片，山墙与后墙是用土砖砌就或夯筑而成的土墙。虽然冬季很冷，但墙厚多数为 18 厘米，少有 24 厘米。通常一户以三间一栋为正房，东西有配房（东乡族语，即厢房），土墙围成的院子使一户成一独立单元。交通工具为摩托车、农用车，自行车不适用起伏不平的山路。但多数人家买不起农用兰驼车，摩托车则较为普遍。

“基本生活需要”的上述内容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动态来看则是满足农民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从再生产看，生老病死等重要环节的需要都是必需的，尤其盖房、结婚、上学、医疗和丧葬是几个主要项目。人的生活需要有整个生命期始终发生的需要，也有一部分是特定时期才发生的需要，没有这些特定时期需要的满足，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就会陷于萎缩状态。

咀头村农民的基本的生活需要，依赖两种形式来满足：家庭生产的自给性农畜产品和用货币收入购买的商品。家庭生产的自给性产品主要是小麦、洋芋和牛羊驴，这些农畜产品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能够满足温饱的需要；但日常生活中不能自给的产品却要依赖货币支出去购买，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主要开支项目，像上学、盖房、结婚、医疗、丧葬等费用需要大量货币支出。问题在于，家庭生产的产品在扣除自给性消费外，能够用于交换的剩余农畜产品极少，货币收入很有限，因而依赖这种自给性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对货币支出的需要。咀头村的贫困，在性质上正是这种货币收入缺乏型贫困。

在咀头村，温饱需要主要仰赖自给，而再生产中温饱以外的基本需要一般难以自给，需要货币支出才能满足。因此，咀头村的贫困更多的不是表现在自给性的实物消费上，而是表现在货币收入上。咀头村农民年人均 1270 元

咀头村调查

的收入，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761 元^①的 1/4。这 1270 元是指农牧业收入，不包括劳务输出收入和政府的各种补贴。问题在于，纯农牧业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自给性的实物收入。小麦和洋芋是两种最主要的农作物，商品率极低，牧业中只有羊的商品率较高，牛和驴是作为生产工具饲养的。1270 元人均农牧业收入，是将实物收入折合成货币收入统计的，是个统计指标，不是真实的货币收入指标。货币收入几乎可以归结为家庭畜牧业，主要是养羊的收入。羊在东乡族是按只论价的，一般 4~5 个月的羊每只售价在 400 元左右，牧业收入可以归结为羊的头数，每户 3~4 只羊很普遍。2009 年养羊最多的上老庄社马占林家有 12 只，有的户一只也没有。咀头村实际人均纯农牧业货币收入约为 500 元，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每年如此有限的人均货币收入是咀头村贫困的主要标志。

三

我将咀头村货币缺乏型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性的农牧业生产方式。

贫困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现象，必须到生产中去寻找根源。经济生活包括人同自然和人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劳动改造的对象，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肯定有影响，干旱草原只能放牧，定期泛滥的河域适于农耕，而岛民总是以捕鱼为主要生计。但自然条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样是草原，游牧生产和定牧生产完全不同，所造成的后果也完全两样；同样是土地，刀耕火种和精耕细作，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生产迥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生产方式。

咀头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农牧业。所谓“传统”，就是指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经验为依靠。这种农牧业虽然已经将最终生产成果纳入目的性因果设定，因此较采集渔猎生产方式要先进得多，但是整个生产中，有目的性的劳动所起的作用还很微弱，这为自在因果性联系的作用预留了巨大空间。咀头村两种主要农作物小麦和洋芋品种的选择就是历史的产物。这两种作物即

^①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2009 年 3 月 5 日。

使在自在因果性发挥作用的时空内，也能较好地保持劳动目的性设定不至于全盘落空。干旱是自在因果性联系起作用对目的性设定构成的最大威胁，小麦和洋芋作为耐旱作物一方面适应了干旱，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人的劳动目的性。东乡族人发明一个专门的词叫“雨水灌”，就是“风调雨顺”的意思。尽管小麦和洋芋耐旱，但旱情过于严重，仍然不会有收成，特别是播种和开花季节，若有雨水灌，则可多收三五斗。所以，与其说干旱造成贫困，不如说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造成贫困。贫困的根因不在天，而在人。牧业也是如此。咀头村养羊是真正的支柱产业，而且“东乡手抓”羊肉是驰名品牌。但制约养羊业的首要生产环节是繁殖，关键环节是饲料。由于贫困，多数农户买不起羊羔，要想多养，繁殖率必须提高。咀头村有三种羊：小尾寒羊、多胎羊和本地羊。小尾寒羊耐旱，育肥较快，但一胎只能生一只，且食量大、易生病；农民更喜欢养多胎羊，一胎可产2~3只。我们在对把子社牟耀祥家调查时了解到，他家2008年养的3只多胎羊，今年下了8只小羊羔。和种麦子、洋芋一样，这里自在因果联系起决定作用。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这种作用也存在，它对出栏时个体体重有重大影响，不过农民已经将劳动深深嵌入生产过程，在出栏前约1个月，加大喂饲洋芋，这是咀头村和东乡县特有的育肥方式。于是剩余洋芋成为关键问题，由于小块土地经营难以获得更多的剩余洋芋作为饲料，养羊规模受到限制，饲养的时间也受到限制。

总体来看，咀头村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农牧业生产中，自然的限制很强，劳动目的性作用还很脆弱。小麦和洋芋的亩产量年度波动相当大，个体家庭养羊的只数同样有很大的波动。2008年“雨水灌”，小麦亩产达到700斤以上，2009年旱情较重，亩产据估计不足500斤。这种靠天吃饭的农牧业，尽管在适度引入化肥、育肥技术后，产量仍然有限。财富创造量少是贫困的根源，即使这些财富全都表现为商品，也会导致货币收入意义上的贫困。

何况，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是自给性生产，这加重了货币收入意义上的贫困。完全自给性生产是不需要货币的，自己一切需要都能通过自给性生产解决，货币又有何用呢？货币起源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基本职能是衡量商品价值和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由待售商品的数量与价格决定。这就是说，货币的存在及其作用始终离不开商品，一种自给性生产方式下，其劳动产品不表现为商品，因而也就无须货币。对于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体来说，其

咀头村调查

收入只表现为实物收入，而不会表现为货币收入。所以，自给性生产方式中，贫困的概念是由实物收入界定的。

如果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方式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也就是说，自给能够自足，那么，即使人均货币收入为零，并不等于其实际生活水平低，因为实际生活水平不是以货币来衡量的，而是以消费的实物的使用价值决定的。问题是，咀头村的农牧业生产可以自给，但不能自足。

和全国一样，咀头村也已经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其经济生活正逐步被纳入到市场关系中，只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死死拖住了这一进程。尽管如此，农民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许多方面和环节已经不可能脱离市场了，这主要包括：

在吃的方面，歉收年不可避免要购入的粮食，这需要货币支付。日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毕竟不能仰赖自给，自古靠市场供应，没有货币收入是不行的。在穿的方面，家庭纺织缝纫手艺基本被现代纺织服装工业所取代，咀头村农民绝大部分衣着靠市场购买。在喝的方面，过去的饮用水是靠运水车从锁南坝镇（东乡县县府所在地）购买，也有自己从山沟里用驴驮水，近年来，自来水工程基本完成，喝水交费，同样离不开货币；茶叶消费在东乡族的量很大，干旱寒冷的东乡不产茶叶，农民饮茶必须在市场购买，到过东乡的人会发现，东乡各类市场上茶叶的经销都是大宗商品。在用的方面，用电需要花钱，用汽油要花钱，农业生产上买化肥、种子、农药要花钱，上学要花钱，看病的医疗费，结婚的用品以及彩礼，丧葬散给来宾的哈吉耶，捐给清真寺以及请阿訇的钱……这些都需要货币。在住的方面，房屋修建尽管有亲友帮工无须支付工钱，尽管有政府的危旧房改造项目和廉租房项目补贴，尽管部分建筑材料，如土坯砖、木料可以自给，但这些都不能将一栋房子盖起来，农民平均盖一栋房子仍需支付万元以上的货币，最低的也要支付 7000~8000 元。在行的方面，摩托车、农用车的购买及其维修等，都是农民不能自给的。

择其要者，农民在子女上学、建房、结婚、治病、丧葬等劳动力再生产几个重要环节上都不能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依赖市场供应。一方面，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农畜产品十分有限，且自给率高，商品率低，造成货币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这种自给性生产不能自足，又产生了对市场的依赖和货币支付的需要。生产方式能够自给但却不能自足，对货币产生了需求但又不能提供足够货币收入，这一矛盾的结果就是贫困。咀头村，乃至整